

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 主编 刘昶

(英) 戴维·莫利 著
郭大为 等 译

Media, The Geography of Modernity the New and Technology

传媒、现代性和科技
“新”的地理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英) 戴维·莫利 著
郭大为 常怡如 徐春昕 译

Media, The Geography of Modernity the New and Technology

传媒、现代性和科技
“新”的地理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英)戴维·莫利著;郭大为等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2

(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

书名原文:Media,Modernity and Technology:The Geography of the New

ISBN 978-7-81127-808-8

I. 传… II. ①莫…②郭… III. 传播媒介—研究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0319 号

Copyright © 2007 by Routledge.

ISBN 978-0415-333-429

本书英文版曾于 2007 年由 Routledge 出版。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Routledge 授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在全球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7-3462

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

作 者:[英]戴维·莫利(David Morley)

译 者:郭大为 常怡如 徐春昕

责任编辑:唐 颖 冬 妮 雁 来

责任印制:范明懿

封面设计:阿 东

出 版 人:蔡 翔

出版发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http://www.cucp.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23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27-808-8/G·808 定价: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一

我对出版这套《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深表赞赏和支持。

我在中国担任欧盟大使已四年有余,我发现,虽然欧洲越来越了解中国,中国也越来越了解欧洲,但遗憾的是,这种相互了解还仅仅局限于政府和外交层面以及商贸领域,在教育 and 研究领域这种相互了解仍嫌不足。

当然,我们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但这尚无法满足中国与欧盟希望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需要。我认为,应该让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都参与到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中来,相关的前提是,中国和欧洲相互了解并理解各自的社会运行模式。

在欧洲,如同在所有先进的民主国家,报刊和其他媒介通过影响公众舆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其他权力机构,如行政机构、立法机构甚至司法机构。因此,认识欧洲传媒的运行模式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欧洲社会。

在欧洲各国,由于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并且由于表达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所以新闻媒体是自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欧洲的新闻媒体就可以完全摆脱各种权力机构的影响及商业利益的掣肘。

因此,这套《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的出版是值得举荐和鼓励的。

我热切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更多的中国读者深入了解欧洲传媒及其运行特点。

这也是了解欧洲本身的好方法。

欧盟驻华使团团长

AS

赛日·安博大使

Seizung, 12 Decembre 2008

序 二

我由衷地祝贺《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的出版。

这套《译丛》的问世不仅会极大地促进中欧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交流,也会丰富相关学科研究资料的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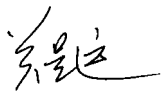
中欧是当今世界两支上升的力量,近10年来,中欧从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发展到全面伙伴关系直至今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远远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中欧之间的合作涵盖了包括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和环保等在内的广泛领域。

但是坦率地说,我在担任中国驻欧盟大使期间,深感中欧相互的认知和理解远远跟不上中欧关系发展的需求。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等差异,中欧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为了保证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双方需要加强沟通、增信释疑。

我认为,在中欧减少误解、加深相互了解方面,新闻传播界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加强这一领域的教育交流是一条有效的捷径,因为它面向青年,面向未来。

在此背景下,《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的出版不失为有益的尝试和值得称道的努力。我希望它能加深中国新闻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对欧洲一些理念和做法的了解,从比较中坚持和完善我们自己的新闻传播学,更加卓有成效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进一步增强中国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驻欧盟使团前任团长



关呈远大使

2009年1月

他山之石 可以为错

(译丛代序)

综观我国(大陆)出版界对西方新闻与传播学界成果的译介,不难发现,相关成果主要聚焦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以及隔英吉利海峡与欧陆相望的英国,而对于欧洲大陆丰富多彩的相关学术研究之译介却寥若晨星。之所以如此现状,多因语言障碍(欧陆诸国语言各异,无一国以英文为官方语言)而译事较为艰难所致。不言而喻,本译丛出版之目的,旨在弥补国内这方面的不足,为我国各界读者了解欧洲新闻与传播学界的研究及其成果提供一个可能的路径。

然而,向国内学界介绍不同于英美国家的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仅仅是译丛的初衷,若能就此帮助国内学界借鉴欧洲学人的见解,磨砺自己的治学,启发大家的思路和言路,举一反三,在我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发展上独树一帜,才是编者真正的企望,即所谓的“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错者,琢玉之砺石也)。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艰辛而有趣的过程,同时也是译者们磨砺自己的过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对译丛中有关新闻与传播学若干关键词做一些译考,并将个中的体会传诸读者。这一努力不仅对译介学术见解是必要的,对读者诸君似乎也将不无裨益。理由十分简单:翻译之于文学作品,是要在忠实原作的前提下,将外国文学原有的神韵,传递给本国的读者,这里面既有信、达、雅的追求,也有译者的再创作;而翻译之于学术著述,则要求译者不仅要传递作者的学术见解,而且还要求在翻译过程中,适当解读和阐释,帮助读者理解原作文字背后的含义,这或许也是译者对学术建设的一份贡献。

毋庸置疑,学术译事除了一些基本的默契之外,在相当程度上带有

浓厚的个人色彩,对一些关键词的翻译亦每每是见仁见智。尤其是当面对约定俗成的译法,甚或是以讹传讹的译法时,的确会面露无可奈何的难色(比如“*field study*”明明就是“实地调查”或“实地考察”之意,可偏偏一直被译为极富诗意的“田野调查”——而今不少的青年学子也乐得去做“田野”。且不论许多的“*field study*”百分之百是在城市里完成的,何来“田野”之有?殊不知,英文中的“*field*”,一如法文中的“*champ*”,对译成中文,即“田地”、“现场”、“场域”等。只有当这一英文或法文单词用做复数形式时,方译作“田野”)。

现将译者们对本译丛涉及的新闻与传播学的几个关键词翻译心得介绍于后,就教于学界同道。

1. media: 传媒、媒介与媒体

西文中“media”一词的含义广泛而不甚准确,它既可以是报刊、电影、广播、电视、视频、电信等承载的文字、声音、视觉讯息的符号之发送、分配或传递的技术手段(工具);也可以是经济门类或体制,如“传媒产业、传媒事业”等;或可以是具体的机构、组织,如“传媒企业”(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等);还可以是具体的传播内容和设备等。以其涵盖的电视为例,人们可以“看电视(节目)”、“买电视(机)”、还可以“做电视(行业)”。

英文中的“media”原本已是“medium”的复数形式,而这一词汇进入法文后,法国知识界为了维护本国语言的纯洁性,作出了相应的语言规范:如今法文中在使用这一外来语词时,标准的用法是在“*média*”词尾加上“s”,写作:“*médias*”!

中文里,相对应的不同译法也有“传媒”、“媒介”和“媒体”等,用法则无界定,多少有点随心所欲。丛书的译者们在彼此交流了认识后,基本达成如下的翻译共识——media 依不同的语境分别译为:

传媒:信息传播的载体、手段、途径、体制等的统称,如大众传媒。

媒介:强调不同的传播技术特性,如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纸质媒介,常见的有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又如,以研究并开发媒介融合为主的新兴学科“媒介电子学”(Media Electronics)。

媒体:突出传播活动的主体性和体制性,常是新闻事业的代名词,

如中央级媒体(全国性的电视台、电台、报社、网站),外国媒体等。

作为补充:与“media”一词相关的另有“Medialogy”(亦拼作“Mediology”)——“传媒学”,这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提出的学术理念(见其著作《法国的知识分子权力》,Ramsay 出版社,1979年),关乎对不同社会中的文化知识记忆、传承和置换方式的缜密研究。巴黎索邦大学于2007年正式开设了“传媒学”这门课程。

2. communication: 传播、传通

“communication”一词,大陆学界通译为“传播”,与之相关的则有“传播行为”、“传播活动”、“传播事业”或“传播现象”等;港台学界则曾译作“传通”,以及“传通行为”、“传通活动”和“传通现象”等。

英语和法语等西方语言中的“communica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communicatio”,指“建立关系的行为或状况”。而现代词义不仅包括传的行为、后果,还包括传的方式、内容以及途径等,因此,在汉译上,出现了“传播”、“传通”、“交流”、“交往”、“沟通”和“交通”等对应词义。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著名学者斯迈司(Dallas W. Smythe)访华期间,在拜访北京大学时,曾以自己的论文 *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大众传播与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验》)的打字稿相赠,时任北大领导的周培源教授后将其论文转赠北大图书馆,并附言说明。也许是当年国内对“Mass Communication”一词的海外中译尚甚为陌生的缘故,周培源先生在附言中,依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取“交往沟通”之解,旧有“交通达贵”之说),将“Mass Communication”临时译作“大规模交通”。

自中国传播学兴起至今,学界一直把美国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William Schramm)的经典之作《传播学概论》(*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奉为圭臬,至少是入门的必读,这是并不过分的。施氏的名作自1973年出版以来,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传播学研究,欧美一些而今颇有建树的学者都从其作中获益匪浅。中国的香港和北京曾分别出版了施作的中译本《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香港海天书楼,1983年7月)和《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9月),两地的译本都是根据此书1982年版的修订本完成的。不同的是,香港的译

本不仅有施拉姆为中译本所作的《新订本序》，而且还舍弃了“全译”，“在原作者的同意下”，采用了译述的方式，亦即在译作中加入了译者个人的阐释与解读，译者是施拉姆的真传弟子余也鲁博士（他在其译作的《译述后记》中解释说，“译时作了一些增删。增加的是属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材料，和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子；删节的是原为美国读者而写或美国人才比较易懂的事例”）。

在余译看来，传通等于传播加沟通，因为“汽车司机看见红灯如何反应，报纸的新闻与社论在民间有些什么作用，电脑科学家怎样教机器修正错误，都属传通的过程”（余也鲁《译述后记》，见《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香港海天书楼，1983年7月）。余译在书前作学术名词译解时，以“传通”来替代“传的行为”，因为人们用“传的行为”来与别人建立起“共通”，“传通”的译法既从名词，亦从动词（“communication”与“to communicate”），相关的学问，则作“传学”（国内学界将哈贝马斯的 *Kommunikations Theorie* 译作“交往理论”。依照余译，或许译作“传通理论”为宜？）；至于“传播”，余译用来对应“mass communication”。

而新华出版社的译本，自始至终都将“communication”译作“传播”，相关的学问则译作“传播学”，“human communication”和“mass communication”分别译作“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新华本对于中国从包括术语界定在内的“‘传播学’学”一直到本土的传播学的学科创建之重大影响，是学界有口皆碑的。

（而今，“communication”在欧洲——至少在法国——名声不佳，因为政府部门、企业、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都纷纷以“communication”——汉译“对外联络处/部”、“对外交流处/部”取代原先的公关处/部，传播因此被视作自我推销或广告的同义词。其实，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关也只是传通活动的一部分。）

关于“incommunication”：无法传通、无法传播

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在大众传媒的影响无所不在的当今社会，人们有一种幻觉，甚或错觉：信息越多，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就越容易、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沟通就越发达；信息技术的增多自然而然保证了传播活动的广泛性。但事实恰恰相反，暴风骤雨般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同

成功对话、成功分享之间并无天然联系。

换言之,信息与传播技术(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发展与普及,前所未有地促进了交流和对话,但全球不同地方的误会、误解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人类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浸泡在各种各样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海洋之中。信息量骤然增加,导致的并不一定是改善或优化传播,而恰恰是无法传通(无法传播)。

从学理上而言,“无法传通”的概念是相对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学派的格言式论述“人们不能不传播”(“One cannot not communicate”)而言的。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认为,学会如何传通,亦即承认“无法传通”。讯息倍增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传通的改善,因为讯息如果要传递、思想观念如果要避免成为物化观念或消极的观念,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其中,一个基本条件是演绎推理必须是共同的,另一个条件则是这些概念必须通过“传媒无法替代的传播网络”来“维持”。(*Petite sociologie de l'incommunication*, in Hermès, 1989, N° 4, CNRS Editions, Paris)

(这个来自法文的传播学术语,英译时曾作“*communicational failure*”,意即“*communication may fail*”。后终因不全等于原意而被放弃,现多直接采用“*incommunication*”。)

3. Identity 与 Identification: 身份与身份认同

identity 源自拉丁语的 Identitas,最早的含义是“同一回事”,在哲学和逻辑学中被译作“同一性”、“同一律”。涉及人和文化时,identity 通译为“身份”、“属性”、“特质”等。中国的一位学者曾经指出:“最普遍的身份现象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意义上的身份。身份意味着社会等级、权利、权力、利益和责任。”(赵汀阳语)心理学上,将对自己和人生目标感到迷茫的现象,称为“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

identification 是动词 identifier 的名词形式,意即“视为同一”、“认为相同”、“认同”、“身份认同”。

显而易见,identity 是一种状况的描述,而 identification 则是一个过程。

由此,侧重某一特殊群体或种族的文化上的归属感的 cultural identity是否译作“文化身份”较为合适?

法国传播学者吴尔敦(Dominique Wolton)指出,“传播活动的世界化强化了文化与传播之间的联系,并将其变成了文化共处的政治博弈。同时,传播活动的世界化,还强化了集体文化认同作为面向开放保留不同身份的手段之作用。文化身份认同分为两个维度:避难式和关系式。前者指面对带有威胁性的开放的身份自省,以及对立于一个不留空间的世界之企图。避难式文化身份的演变有可能朝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后者正相反,关系式文化身份认同指的是同时治理身份与关乎国际社会的联系、身份与民主价值体系的能力。这是反作用于传播世界化的两种集体认同方式。”(*Sauver la Communication*, Flammarion, Paris, 2005)

4. public sphere: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是德文 Offentlichkeit 的英译,常见的英译汉为“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Offentlichkeit 的法译为 espace public(若转译成英文则为 public space。同一个德文单词,中间只经过一次转译, sphere 就等同于了 space)。德文 Offentlichkeit 由形容词 offentlich(意即“公开的”、“公开发表的”、“公开传布的”) + 抽象化名词词尾 keit 结合而成,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

虽然“公共领域”的译法更接近于欧洲古代政治文明的概念,而且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市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t)等概念互相呼应。但是丛书的译者们仍多倾向于译作“公共空间”,理由主要是这一译法有别于欧洲文明史诸概念,而更加接近中国的研究语境和研究理念。与之相关的 private sphere、civil society、citizen journalist 等词,也因此就顺理译作“私人空间”、“公民社会”和“公民记者”。(此外,另有 *public sector*, 对应的汉译为“公共范畴”,多属于经济学概念。)

“公共空间”最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概念,长期鲜为人知,后经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努力才重新被人重视。哈贝马斯认为,政治事务成为公众辩论和公开争议的话题,所以受制于国内公共輿

论。作为当代民主的基本内涵,公共空间对于反思大众民主而言,极为有用。它是介于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场所,它也是不同的个人和团体之间相左的意见表达及交流的象征性空间。传媒在公共空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传媒空间不是公共空间的同义词,因为后者更为宽泛、更为复杂。较之政治空间,公共空间也更加宽泛。公共空间的形成需要时间,以便形成自己的词汇、价值观,以及足以贴近可供讨论、反对或商议的相关内容的视界。人们无法决定公共空间的存在,而只能证明它的存在。

最后,关于本译丛还有几句话需要补充:

一、当听说欧洲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成果有机会系统地(至少是有一定规模地)被介绍到中国时,原著的各位作者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无一例外地为中文版作序,这成为本译丛的特色之一。欧盟驻华大使安博先生和中国前驻欧盟大使关呈远先生欣然应约为译丛作序的美意,则可视作欧中高层对相关学术交流的鼓励。

二、我也十分愿意借此机会,感谢译丛所有的译者,他们都是海内外资深的新闻从业人员,不仅兼备中外文的厚实功力,而且还具有经年的职业经验。在他们提笔给报刊写个“豆腐干”稿件,便可很容易获得优厚稿费的今天,他们依然不顾当前国内学术界微薄得几近可怜的译酬,应承了这份学术译事,并且精益求精,这在市场化浪潮汹涌的时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奉献着实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信念:共同为我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做些努力。当然,这般努力不仅完全是译文的质量标签,而且还成为本译丛的另一特色。谨向诸位译者致以敬意,同时亦深表谢忱。

三、在译丛的编辑过程中,罗青、甘露、林晴、李娜等同仁曾热忱相助,或代为组稿,或协助校译,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

刘昶 谨识

2009年初于京东

中文版序言

对于一位作者来说,能看到自己的书被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出版永远都是一件令人感到荣幸的事情。然而,出于很多原因,我特别荣幸我的这本书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我认为,这本书的确应该被介绍到中国去。

正如我在我以前的一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到的,中国研究不是我的专长。我对于中国的了解都是来自二手资料,一方面是通过英国的媒体,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越来越多到我所任教的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 College)媒体与传播系攻读硕士的中国学生(说到这里,我应该感谢郭大为,他是众多来金匠学院读书的中国学生中的一位,是他提出来帮我联系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同时担任本书的翻译工作)。

当然,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么大一个中国的变化,我认为西方世界再也不能把中国只是当成对于当代世界议题讨论的某种补充。关于这些议题的谈论应该重新思考对于中国的认识。

在媒体研究领域,“去西方化”(de-westernisation)和“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的迫切要求已经被人们广泛提出。过去太多的媒体研究的分析前提都是基于民主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而这些前提其实是不能不加批判地“出口”到其他具体社会条件下的。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来说,这些西方理论的假设前提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很显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只希望我的这本书可以帮助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建立一种适合当代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分析模式。

同时,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够理解我在书中特别提到的一种观念,那就是,对于处理类似“全球化”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发展区域化理论来研究这个普遍化过程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下有什么不同的表现方式。或者说,我们要致力发展“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这样就可以提出适合特定情况和脉络的分析视角,而不是提出那种企图“一物多用”的抽象理论模式。我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会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即使我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可能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但是仍然为反对不同层面的普遍化理论诉求作了有必要的补充。

本书的论述起点是关于历史和地理的关系问题。我们对于历史和地理的感知从来都不是没有关联的,对于一方的感知常常不可避免地被转化成为对于另外一方的感知。从这点来说,过去和将来可以理解为地理概念,这就如同西方和东方可以理解为时间概念一样。所以,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我们应该从地理和历史两个角度来理解“现代性”以及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新”。于是,我本书的副标题就是“新”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New*)。

用一个例子简单地说明我的观点。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经列出过一个广为人知的“从15世纪到20世纪世界上最耀眼的城市名单”。在布罗代尔20世纪中期撰写的这个名单里,这些城市包括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和纽约。很显然,这个名单完全体现的是“西方”的历史发展进程。可是,到了今天,这个名单也许应该把上海或者深圳这些城市也加进去。由此可见,那种把社会进步完全等同于西方新事物发展的观念已经陷入了危机。看起来,世界的未来应该被放置在东方,而不是西方。自从我跟我的同事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在我们1995年合著的《认同的空间》^①(*Spaces of Identity*)里提到“科技东方主义”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有关“未来”与东西方社会的关系问题。

为了稍微具体地阐述“现代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到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城市。一个关键问题是,现代化城市在未来将如何演绎

① 参见〔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注

现代性的表现形式。我想以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为例,它们现在宣称自己也应该被列入那个“世界城市”名单之中。我想,这对于中国也会有些参照意义。

在2005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纪念册上,有一篇关于杰夫·沃尔(Jeff Wall)的感人摄影作品《从阿里卡可禹到马哈贝莱来的乡下人——伊斯坦布尔1997年9月》^①的讨论。沃尔在谈到自己的这幅作品时说道:“伊斯坦布尔被称为一个巨大的安纳托利安(Anatolian)乡村。其实,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大农村。它们是旧的城市和新的后现代乡村的‘新’组合。”正如克雷格·伯纳特(Craig Burnett)对这幅作品评论时指出,“这幅作品表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离开他的故土到伊斯坦布尔闯荡。他跟其他人一样,是一个游走的工人、一个后现代游民。支撑他在城市里待下去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压力。”我想,这大概与中国很多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生活的人是一样的。可是问题是,谁知道这些并非“合理合法”地蜗居在这些后现代乡村里的人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里还有一个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这些城市未来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将会与西方的现有模式相区别。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涉及了城市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发展和未来。他们对于城市的基本观点是,传统上对于城市的定义、组织方式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的理解也许已经过时了。在西方,我们通常认为,城市不仅仅体现在规模上,还应该具有一系列的特点,譬如财富、好的设施和合理的基础建设,而且后者通常是前者的必要保障。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发展最快的城市都不具有这些特点,可能只有东京将很快成为前十大城市中唯一富有的城市。对于孟买和拉各斯这些高速发展的城市来说,他们的发展并没有伴随着工业化的普及、基础设施的提供和工作机会的创造。过去城市规划中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在这些城市被非正式、没有规划、自建和自助的网络所替代。

① 照片的英文标题为 *A villager from Aricakoyu arriving in Mahutbey - Istanbul September 1997*。这两个地名由作者音译而成,可能不准确。——译者注

正如库哈斯和他的同事所言,这些高速发展的城市“改变了所谓‘现代化城市’的所有基本特点”。它们并未变成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它们也许应该被看成是“‘全球现代性’发展前沿的经典案例”。同时,它们并没有在赶超西方,相反,它们也许为西方展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情形。它们通过一种新的都市主义形式挑战了我们关于“什么是城市”的思考。

回到沃尔那幅摄影作品,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并不是那个照片中的男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模样,而应该是思考像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未来将成为什么样子以及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思考方式去面对这些城市的未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需要去认识在当代中国推动这些“新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内在机制。如果本书可以帮助大家从文化和科技的角度理解这些内在机制,那么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戴维·莫利

2008年4月

全书介绍

本书汇集了多年以来在媒体和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有关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许多论争。这些论争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其中包括媒体和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科体系中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还有新的科技手段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同时,本书还将谈论到新科技的出现怎样改变我们对于“现代性”这个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怎样挑战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对“现代性”的解释方式。

此外,本书还将谈到目前在媒体和文化研究领域由于研究理论和方法过于守旧而出现的学科危机。就媒体研究而言,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于怎样通过确立新的研究对象使这个学科积极有效地回应科技的革新和发展。具体而言,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媒体研究者应该摆脱过去那种完全以媒介自身为中心的理论框架,进而把关注焦点调整到影响媒介存在和发展的具体问题上来。只有这样,媒体研究才不会脱离媒介所处的不断变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脉络。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调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兴趣。这种调整的背后其实包括了对于申请研究经费和发展媒体教育的实际考虑。尤其在对媒体教育的现状充满担忧的英国社会,这种调整更是体现了如何将媒体和文化研究建设成为一个“合格的学科”的问题。

为了探寻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的研究涉及众多的学科。这些学科包括文化地理学、人类学、人种学、艺术设计、文学理论、艺术史以及后现代理论和区域研究。基于这种跨学科的理论基础,我获得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尝试突破传统的欧美视角来建立一种完全“去西方化”(de-westernized)的媒体和文化研究格局——这也正是我期望本书对于媒体和文化研究领域所能作出的贡献。